

張伯苓

教育智慧格言

Zhang Boling's Wisdom about Education

梁吉生 / 主編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張伯苓

教育智慧格言

Zhang Boling's Wisdom about Education



梁吉生 / 主 编
张兰晋 / 副主编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封四贴有含人民教育出版社注册商标的标识，无此标识者视为盗版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伯苓教育智慧格言/梁吉生主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107-31301-1

I. ①张… II. ①梁… III. ①张伯苓 (1876—1951) —教育思想
IV. ①G40-09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2384 号

张伯苓教育智慧格言

出版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 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4

字 数 207 千字

印 数 2 001 ~ 4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使
用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电话: 400-810-5788

编者前言

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张伯苓教育智慧格言》，是有关张伯苓教育言论的精华汇编。

张伯苓是何许人？

他是——

一个上不起正规私塾的童年，

一个只能上非主流学校的少年，

一个当塾馆教师的青年；

他又是如曹禺、老舍所说的——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天下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这个张校长就是张伯苓。

张伯苓是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体育先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以兴学育才为本，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系列学校，一生献身教育，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作出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绩，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民办教育卓有建树的丰碑。

张伯苓不仅是南开校长，而且是创校校长，是南开系列学校的校长，几十年南开的创建和发展，始终闪现着他不倦的身影。西南联大时期，他与梅贻琦、蒋梦麟共任学校常委。他还先后兼任直隶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和清华大学筹备顾问，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代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青岛

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特聘委员、天津工商学院名誉校董、四川自贡蜀光中学董事长，并且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抗战期间，他还是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以及包括12个教育学术团体的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的理事长。

张伯苓和他创办的南开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孙中山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

梁启超称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

蔡元培称南开为国中知名之学校。

胡适称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颜惠庆称张伯苓“无论国内国外，全是异口同声，承认他是教育界有成绩的一位领袖”。

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令给予一等景星勋章，以示优异。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同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沙坪坝看望张伯苓。

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颂词称：“张伯苓，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建人及校长；设立学校，作育人才，全国景仰，举世推尊。五十年来，献身教育事业，培植青年，改造中国，一心一德，始终不渝，实乃民族信念之象征。”

1947年，胡适撰文《教育家张伯苓》云：“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时间到了1986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与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在南开大学召开大会，纪念张伯苓110周年诞辰，赞扬张伯苓是一位“著名爱国教育家”，他的一生是“进步的一生，爱国的一生”。

张伯苓在近现代教育史上的标杆地位重又得到确认。

如今，在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都矗立着张伯苓塑像，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建有“伯苓亭”。

张伯苓的名字，成为莘莘学子砥砺前行精神象征。

(一)

张伯苓，名寿春，1876年生于天津，卒于1951年，是历经晚清、民国到新中国初期，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人物。他青年时代所感受的，既有外侮日亟、积贫积弱的刻骨铭心，又有御侮图强爱国潮流和新学新思想的蓬勃兴起。

私塾先生的家庭出身，使他无力走上青灯黄卷的举子之路，13岁就进入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受了五年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训练和政治社会学说的熏陶。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

张伯苓的毕业季，正是清朝政府战败于甲午中日战争之时，走出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门，被派往北洋海军“通济”舰。三年的海军生涯，亲身经历了清政府屈辱拱让山东威海卫给日本及英国的交接过程，使他报国强国理想受到沉重打击。他愤然叹道：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张伯苓以其早期的经历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他的世界很大，有奇异美妙的梦想，有矢志上进的毅力，有他人没有的魄力和勇气。

1898年，张伯苓回到天津，开始走上兴学校办教育的艰辛之路。这时张伯苓只有22岁。谁也没想到，日后启动北方新教育崇高使命的，竟是一位海军青年水兵。

新教育是从科举的“出身本位”向新式学校“学识本位”的制度化转型，关系到国家人才观的重大变革。张伯苓从晚清就参与了这一变革的试验。最初的“试验场”是天津严修的塾馆。严修聘请张伯苓教授子侄英文、算学、理化课程。一个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世界，悄然敞向张伯苓的青春岁月。

严修是一位与时俱进、变革趋新的教育家。他刚刚卸任贵州省学政，回到天津办家馆倡导新学。张伯苓与严修有共同的价值坐标，相交风义数十年。严修的博学、深思，睿智的识见，以及静穆之修养，令张伯苓折服。他尊称严修为南开“校父”。

严馆成为支撑张伯苓之所以感动近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原点。青年张伯苓没有冬烘先生的迂腐气，也没有旧塾师以戒尺和教鞭禁锢幼小心灵的陈规。他朝气蓬勃，持旧创新，打破私塾教育的固有程式，把新教育的样式安放进儒学的制度安排中，从而开启了私塾教育导向新教育之路。

新的教育格局需要新的知识结构来支撑，也需要确立新的知识阐释模式。张伯苓早期教育实践及其对新教育的最初探索，无疑是其教育思想润养的坚韧内核。由此建立起解构旧教育、建构新教育的信心和信念。

张伯苓不断地积累着对教育最初的了解。

1904年，他与严修等人在家馆私学的基础上缔造了私立南开中学的前身——敬业中学堂。南开甫一成立，即始终坚持“作中学之模范”的精致，为社会转型时代的教育立定醒目的标尺；而其令人信服的“黏合度”、强大张力和开放性，它的鲜明特色和整体气象，亦成为孕育南开文化的胎床。

南开教育光谱迅速扩展。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成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建成南开小学，创造了脐带相连的奇

迹，为那个年代的天津涂抹出亮丽的色调，显示了一种根扎乡土、爱洒桑梓，通过系列学校凸显“地方性”对于教育空间的整体建构价值。

全面抗战前爆发前一年，即1936年，又在重庆创建新的南开中学。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

张伯苓以其不可复制的定力和信仰，构建起巍峨南开大厦。在中国近现代教育谱系中为南开安排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并且成为百年不衰的鲁殿灵光。

岁月更迭，春秋代序。南开总是以优良校风、教风、学风，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在张伯苓“我校期造完人”育才观导引下，各地莘莘学子，甚至海外华侨纷纷负笈而来；学生家长也以“入得南开，便可放心”的归属感，以子弟能进入南开读书为荣。

黄炎培与胡适曾经有过一段对话：

黄炎培说，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

胡适答道，老实说，我自己的子弟“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

民国初期，南开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天津是青少年学子聚集密度最大的私立学校。南开以其中西融合价值观哺育每个南开人。

1917年1月在南开演讲表示“鄙人旅居津门时，即希令子弟来斯学校”的梁启超，有四个子女先后在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中学就读。他们是四子梁思达，女儿梁思懿和梁思宁，及最小的儿子梁思礼。

胡适的内侄江泽涵在南开大学，侄儿胡思猷在南开中学。

晏阳初最信服张伯苓办南开，四五个子侄都在南开读书。

1937年12月陶行知的二儿子陶晓光带着弟弟们逃难到汉口，陶行知得知后，立即写信给陶晓光让他把小弟弟送到重庆南开托付给张伯苓，并说“他认得我，不会拒绝的”。

抗战时期，住在重庆歌乐山的冰心，也把12岁的儿子送到南开读书。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强调，“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翻开当年南开学生名录，一大批后来成器的名字跃然纸上。

1906年南开中学堂师范班毕业的陶孟和，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08年南开中学堂第一届毕业生33人中，走出两位清华大学校长（金邦正和梅贻琦）和一位清华大学教务长（张彭春）。

周恩来，1913年考进南开中学，1919年入南开大学。张伯苓称他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1919年至1937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学生中，出现了近30名院士。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届南开中学毕业生杰出人才如井喷般涌现。当时还在读初中的梁思礼，后来留美回国之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吴大猷自14岁至24岁在南开生活了十年：南开中学四年，南开大学四年，留校又任物理系助教二年。他说，这十年“是性格、习惯的形成，求学基础的训练的重要时期”。与他一起进入南开中学的两个堂弟吴大业、吴大任也毕业于南开大学。

后来吴大猷成为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吴大业成为经济学家，数学家吴大任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多年。吴家三兄弟被称为南开“吴氏三杰”。

1926年，与吴大猷同年进入南开大学数学系的陈省身，后来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大师。

第一个获得号称“气象诺贝尔奖”（国际气象组织奖）的中国人叶笃正，与他的四个兄弟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成（方实），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进入了南开中学，都是学有所成的俊才。2006年1月，叶笃正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与天津名门叶笃正家齐名的另一书香门第叶恭绰家，不仅叶恭绰以诗词、书画、鉴赏、收藏古物闻名于世，他的妹妹叶恭绍走出南开大学后，也成为新中国著名儿童少年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

被称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的严仁英，是严修的孙女。从南开女中毕业后，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师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重庆南开中学是抗战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张伯苓后期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教育功能定位影响抗战后方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战时中等教育之代表”。

重庆南开中学走出的学生包括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等30多名两院院士。

朱光亚是吴大猷在西南联大时的助教，他和周光召都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曾是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的郭永怀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朱光亚曾经说：“‘两弹一星’的核心组织中有四分之一是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

重庆南开中学还涌现出众多各领域的著名人物，如邹家华、汤一介、吴敬琏等。齐邦媛1938年入重庆南开中学。在台湾，她有着“永远的齐老师”之称，85岁写成33万字的《巨流河》，是在海峡两岸文学界共获好评的“杰出作家”。

被尊为台湾“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比齐邦媛晚三年进入重庆南开中学，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创始人，有“芯片之王”之称。

南开系列学校还涌现出大批文化艺术领域的人物，如曹禺、金焰、石挥、黄宗江、端木蕻良、韦君宜、查良铮（穆旦）、王辛迪、王瑶、周汝昌、沈湘、黄裳、阎肃等。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极为艰难的教育环境中，保持和发扬三校的优良传统，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中央研究院”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其他领域众多著名专家学者，被誉为“学府北辰”，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2003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就是代表之一。他毕业于南开中学，考入南开大学，是西南联大极少的N字号（南开大学籍）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生。

一个教育家的出色优秀，在于他创办学校的质量实力，在于学校培养的高素质优秀人才。在半个世纪的磨洗和锻造中，南开托起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两代南开人。

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南开人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张伯苓是提供肩膀的巨人。

值得提出的是，抗战结束后的大规模清查附日汉奸运动

中，南开竟然无一人成为惩处的对象。1947年1月，中央通讯社总社编辑部主任兼副总编辑唐际清（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南京讲话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南开学校毕业生。”

同年3月，时任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向十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的张伯苓报告说：“经在平津地区调查，整个抗战期间，南开学生没有一个投降日本人的。”

一个学校人才的质量，不仅反映了这个学校的品格和精神面貌，而且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质量。

张伯苓通过作育人才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二）

南开是私立学校，没有国立（公立）学校那样国帑的专一支撑，也没有有的学校那样的美元硬通货，更不像一些私立学校有固定的实业大亨作办学“压舱石”。南开是托钵题缘，吃百家饭，穿百衲衣，深得社会支持的学校。有人因此背后说张伯苓为化缘的老和尚。张伯苓称南开是“社会之产儿”，社会是“南开之保姆”。

这就给南开带来办学经费的不固定性和丰歉的不平衡性。而近代中国没有社会捐资传统，“捐资助学”之难可想而知，因此，经费短缺，成为南开与生俱来的办学常态。

张伯苓常常是欠债办学，寅吃卯粮，最困难时教职员发不出薪金，只给工人开工钱，会计发给半资。他向人募捐，求告无门，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白眼。他说，最困难的时候，就好像南开大学大中路上的小树也在向他哭泣。他沮丧

过，但从未放弃过。

在经费万分困难之中，张伯苓很可以接受外国教会的资助，而且外国教会也的确不止一次地向他公开表露南开可以变成教会学校，以解办学经费捉襟见肘之窘。但是，张伯苓咬紧牙根不向外国教会乞求，而且很肯定而严正地说：“谢谢！南开是中国人的学校。”

在经费万分困难之中，绝不把学校变成赚钱渔利的“学店”。早在1924年，张伯苓就一针见血地批评教育界“有两种恶趋势”，其一为商业化，其二是官僚化。对于张伯苓来说，以南开当时办学之隆誉，倘应达官贵人所求为“富二代”、“官二代”网开一面，或者卖点文凭，就会立马得到一笔可观的“捐款”；倘脑子稍微活络，在学生身上打些主意，巧立一些收费名目，南开也不至于年年“欠债办学”，起码可以略解燃眉之急。但是，张伯苓在这方面很是固执，绝不肯开“学店”，绝不搞商业化，办学原则绝不半点灵活。张伯苓公开提出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不搞邪门歪道，自毁声誉；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世，不以学校为致富门径，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三曰不假——不自吹自擂，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更是学校的“校格”。

张伯苓公私分明，从不枉花学校一分钱，即使因公花钱也是省了又省。他到北京公干，通常都是坐三等车厢，住前门外最便宜的旅馆。可他对于困难学生却舍得资助，学校会计室总有他的欠账挂单，他的校长薪资入不敷出时，只好暂借校款以行周急济困之举。

张伯苓不是夤缘攀附的人。当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曾经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长，但他以离不开心爱的教育为由婉辞谢

绝。张学良决定到张伯苓家中拜访，他的汽车在天津市区转了多时，才在一个晒羊皮的胡同找到张宅，看到的则是普普通通的平房。张学良不禁感叹：“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是的，常人无法理解张伯苓不暇席暖，仆仆于募款路上，几千、几万、十数万，为学校盖起一座座楼房，竟没有替自己建造一座“校长公寓”。

有一次甘肃禁烟总局王某人的儿子想入南开，以珍贵的貂皮、鹿角作见面礼物。张伯苓一面照校章考试录取，一方面退回礼物，并附言写道：“蒙惠皮角，极感。业由邮局取来。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张伯苓一生洗手奉职，从不亵渎办学者廉洁清凉之士的声誉，从不玷污学校这块神圣清纯之地的招牌。作为一校之长，公正清廉，以身垂范，影响着教职员工的内心自律，为良好的办学风气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

教育家不一定成为公众人物，但一定有社会良知，对天下家国公共道义有很强的关注和担当情怀，是社会道德先生。在那价值错乱年代，张伯苓以其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明睿和勇气，大张挹伐普遍流于自私、放纵和道德颓塌的社会风气，伸张社会公德，直指人心涤荡灵魂，令人怵然警醒惭愧难当。其人格如水上之荷，其襟度如光风霁月。无论在道德操守上、国民精神上，都成为净化社会风气的驱动器和正能量。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对一些著名人士有过精彩的评论，意味深长。他说：

“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一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

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高尚可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三)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教育问题需要去面对，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教育困境需要去逾越。每个时代都需要直面教育难题的教育家。张伯苓从晚清一路走来，他所经历的是一个时代的宏大叙事。他的生命轨迹所展示的绝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事业成功者，而是一个以其全部奉献探寻中国教育之路的先驱和思想者。他总是把学校与教育全局联系起来，把教育与社会统筹起来，屹立潮头，紧扣时代脉动和社会吁求，不断地思考、检视、判读、实践，用自己的体认丰富、补充教育共识，破解教育困境，引领学校和教育发展。以南开看似平常而又实不平凡的业绩回答了中国应当办什么教育、怎么办教育的根本性问题，阐明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核心要义。

张伯苓是时代杰出的思考者和实践家。他的教育思想不仅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而且有今天我们仍在大力倡导的创新品格和今天我们仍显缺乏的文化内涵，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生命力。

张伯苓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突出贡献如下。

第一，创造性地构建近代化私人教育体系，使私人办学这一传统形式得到更新蜕变，提出“私立非私有”新思维，建立社会参与机制，激励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使民办学校这个平

台更有自由与传统会通、中学与西学融合的文化环境，成为民国时期教育的精髓之一。

第二，坚持不懈地进行实践，对西方教育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所作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提供了范例。

学习、借鉴西方教育，促进中国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化，建立近代化教育体系，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中心主题。张伯苓教育理念的核心是现代意识。他去美国留学，并且多次赴欧美及日本考察，纵览东西之长，有一个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比较视野。在教育整体路径的考量下，把中国和世界相联系，始终以开放的文化形态，追踪西方教育发展潮流，比较鉴别，取精用弘，择善而从。他能够在走弯路后及时拨正方向，有教训之后及时总结，化逆境为助力，并且在学习西方教育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正当中国教育还处在“概皆洋化”照抄照搬西方教育之际，他就提出，“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强调欧美的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可以学习，但他们的社会制度不可以照搬到中国来。张伯苓对中国教育症结，一语破的，直指底蕴。昭告人们，中国教育发展路径不能全盘依恋西方中心世界的单极体系，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张伯苓教育生命中标志性时期，也是南开教育活力张扬、创造性流光溢彩的年代。1928年制订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从而将西方教育的价值模式，

因地制宜地内化为中国化的价值认同，对中国教育近代化施加正向的影响。

《方案》从“中国问题”的高度，提出了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从与本国文化传统重新接轨的吁求上对大学功能提出新见解。这不仅创造性地开辟了南开大学独具特色的办学道路，也表达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全盘西化的反思及其教育理念的现代构建。

第三，培养有“现代能力”的优秀人才。

能力的培养是张伯苓教育理念的一个显著特征。张伯苓以未来眼光，从社会需要出发，痛切感到“中国所最感缺乏者，厥为有‘现代能力’之青年”，而教育“最主要的目标则为培养学生使之有适应现代生活及解决问题之能力”，关键是要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

“现代能力”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品质，是要追逐广博的人文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它超越了单纯的职业训练，包含着创新变革勇往直前的能力。

20世纪30年代初，张伯苓又手订“允公允能”南开校训，意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对“现代能力”进一步给予质的规定性，进一步强调只有德才兼备才能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张伯苓“现代能力”的人才理念，展现了其教育思想洞烛是非的价值导向意义。

1944年，张伯苓撰写的《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可以说是他作为成熟教育家的历程和思路。他的教育理念和经验，那些符合教育规律的精粹，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1. 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工作首位

教育的根本是在学校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张伯苓说，教育